

孕產婦專科

蘊藻 鰾藻 萍藻 浮藻 曾藻 糠藻 青藻 蘋藻

當錄譯粵造縣上西平縣造森援愛園用

本书由法国 粤造社云礽礽礽出版社授权出版

悅 寶 藏 功 難 禁 難 禁 土 漢 城 耳 通 漢 責 刺 封 通 標 龍 藻 勻 哉

奈藥要加果曾乃布逢登錄星勻燥綜藻

奈藻藓燥曾孕癯蚤蚤蚤早匀燥瘵藻月蚤蚤蚤蚤

礞石散
礞石散
礞石散
礞石散
礞石散
礞石散
礞石散
礞石散
礞石散
礞石散

裁 匪 曉 梁 藻 田 豫 元 京 豫 象 京 惠 豫 京 田 國 豫

裁匪曉操藥用豫元京豫象京惠豫京區康區

耕野翁 梁灝 岳員 錢煥 陳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我忏悔 / (法) 菲力蒲·阿蒂埃尔著；袁粮钢等译. — 深圳：海天出版社，2004

海天出版社 图出字001

(西方社会纪实译丛)

ISBN 7-80647-111-1

I 我... II ①菲... ②袁... III 纪实文学 原作品

集 原法国 原近代 IV ①I565.65 ②I565.6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4)第001号

海天出版社出版发行

(深圳市彩田南路海天大厦 邮编 518040)

电话：(0755) 2611111

责任编辑：胡小跃 封面设计：刘瑶晖

责任技编：卢志贵 责任校对：张瑶玫

海天电子图书开发公司排版制作 电话：(0755) 2611111

深圳市宣发印刷厂印刷 海天出版社经销

2004年 1月第 1版 2004年 1月第 1次印刷

开本：787mm×1092mm 1/32 印张：12.5

字数：100千字 印数：1000册

定价：12.00元

图字：01-2004-001号

海天版图书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海天版图书凡有印装质量问题，请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前摇摇言

这个历史学家是个窃贼。

一个风和日丽的日子，他隐姓埋名来到一个城市，按照一个同谋提供的资料，径直来到图书馆，悄悄地钻进档案库。在那儿，他打开一个又一个硬纸夹，标出所找的东西。在把档案内容做出估价之后，他眼光独到地从中挑选了一部分。从这些发黄的纸页当中，他抽出一些生命，通过撬门破锁进入其中。他扯下这些生命私生活的面纱，获取他们的秘密，迄今为止一直被严格保守的秘密。档案主人顾不了这么多了，因为历史学家已经走出了他们匿名的暗影，把他们留在黑暗中的生活暴露在光亮之下。他挖掘出了一些片断。偷窃得手后，他把档案进行了整理，以便找出可以确认受害人身份的蛛丝马迹。他有时删除一些专有名词，然后不留痕迹地离去，腋下夹着偷来的战利品。那是一大叠生命啊！

历史学家是独自行动，不过从大的方面说，他属于一个有窝藏网的团伙，其成员说一种语言，使用一种代码，遵守一种纪律，分享一种幸福。每个团伙都有其特殊之处，有些团伙是由一些文化扒手组成的，他们跟踪受害人，决定从受害人那里偷窃一段生活片断；另一些团伙则更喜欢持枪行劫，他们找到一个仓库，强行侵入，带着电脑，把一切都席卷而去；还有一些是入室盗窃的家伙，他们常常选择单门独户下手，留心房主

的来来往往。当假期来到，住客离去，他们就潜入室内，把里面的东西从底到顶盗个干干净净。这些历史学家并不只盯着值钱的东西，他们细心地把每个抽屉都倒空。

可是有些档案是没法偷的。面对档案，历史学家只有两个选择，要么踮起脚悄悄地离开，要么带着档案一起走。当硬壳卷宗隐藏起一些平凡生命的叙述，当封皮壳面包起一句别有意味的话时，历史学家的手就突然犹豫起来，变得僵硬，他没法偷走，只可能带走卷宗。

这就是我遇到的情况。几年前，有人告诉我“一个窝子”，“一个油水很足的窝子”，不过那里面住的是一些与众不同的人。人家这样说。为了弄清情况，我去踩点，小心翼翼地绕着房子走了一圈，观察来来往往的人，辨认每个居民，记录他们来去的时刻。几天以后，我趁房主外出的机会，撬门入室行窃。可是你们瞧，宝库里并没有我原先认为的东西，我的工具用不上。当我伸手去取时，那些档案忽然都躲了起来。一起消失的还有作者的面孔。

我原以为发现的是一大堆关于偷窃、逃税、杀人以及其他犯罪行为的记述，可是躺在我眼皮下的这些材料却全然不是这回事，它们是充满痛苦和叫喊的回忆。人们是偷不走叫喊，偷不走情绪的。没法把它们装进口袋，带回家，小心地收好，然后再在橱窗里展览。有一阵我想抽身离去，我发现那些档案更加安静了。可是大门既然撞破了，既然我听到了里面的叫喊，我就无意中成了这些特殊生命的目击者。它们向我展现了常常埋在黑暗中的东西，把一些平常的“贱民”送到了光天化日之下。我被打动了：从此，我将与这些“粗暴的生命”一起前行。

这些人常常小心地把出口锁上，拿起笔来写作他们的犯罪

生涯。当年研究犯罪的专家如亚历山大·拉卡萨涅和隆布罗索也被这些文字打动。他们精通犯罪学知识，从1884年初开始，他们就以自己的研究与著述对这门学科的发展作出贡献。他们原以为不会被打动，可是几个罪犯十分圆满地把他们的一些论点和他们关于生命的叙述融合在一起。从这两种想象的碰撞中诞生了一种无法归类的体裁，一种非同一般的叙述。

一个世纪以后，这些文字的生命仍然保留着这种强烈的抵抗能力。它们拒绝被人说明，不愿被犯罪学家利用，也不愿被历史学家利用。它们仍在抗拒我们。

我之所以能够深入“平常罪人”中间，首先要感谢菲力普·勒热纳：是他在1884年一个晴朗日子送我去里昂查阅市立图书馆的旧书库。里昂市立图书馆的馆长皮埃尔·吉纳尔敞开大门欢迎我。米歇尔·佩洛引导我的研究，把我进一步送进这些幽深的库房。阿兰·柯尔班、罗热·夏提埃、达尼埃·法布尔先后予我以帮助。安德列、多米尼克、艾马纽埃、斯黛法纳、达尼埃、克里斯托夫和皮埃尔一家子都是支持我的人。艾莱纳·蒙萨克雷继里夏尔·菲吉埃之后，成了我的支持者群体中十分能干的首领。最后，阿尔莱特·法尔日把我领入这个罪恶之乡，巴尔巴拉自告奋勇陪我走完全程。我在此衷心地感谢他们。没有他们，我是没法独自走完这段路程的。

本书的来历

这本书已经有一个世纪了。

事情要回溯到 1835 年。那一年，一个年轻人因为敲诈勒索遭到逮捕，被送到里昂的看守所。本书的头几页就是在圣保尔这座监狱的一间牢房里写出来的。

在圣保尔看守所，本书的写作一直持续到 1845 年。继这位勒索者之后，一些别的囚犯先后拿起笔，续写本书。其中有一个杀害父母的罪犯、一个流氓，还有几个杀人犯。后来，又有一个惯盗给本书增加了一些篇幅。这些人都在书里详细叙述了把他们一直送上人类审判台的命运。

尽管本书在 1845 年就完稿了，却没有得到正式出版。不过 1846 年以后，1846 年 1 月 1 日，法医学教授亚历山大·拉卡萨涅在他辉煌的职业结束的时候，把他的全部著作和档案捐给了里昂市立图书馆。这部非同一般的手稿就在教授这套收藏之中。

1846 年以后，到了 1846 年，在拉卡萨涅书库，我找到了这部未经出版的书稿。它是由十多个作业本合起来的。一个世纪之前，一些人在本子上细心记下了他们的生活，而一个医生定下了不同凡响的计划，把这些本子收集在一起，编成了这部难以出版的“犯罪生活实录”。

这些犯罪生活实录是由新生犯罪学的一个著名代表从上世

纪一所法国监狱中选出来的，作者是当时羁押在监狱里的几个囚犯。而书稿的创导人，挂名的主编亚历山大·拉卡萨涅，则是给这些囚犯诊病的医生。

这部书稿有一个场所：监狱。在上个世纪末单独囚禁犯人的这座监狱不仅是让人写书的空间，而且是表演的舞台，它以强加给犯人的条件及催发的想象参与了这部书的完成。犯罪生活是它的产物，也就成了监狱一种独特的隐迹纸本（一种可以擦去旧字写上新字的羊皮纸本子，但是可以用化学方法使擦去的旧字显现出来）。换句话说，监狱构成了这部手稿的记录方法，一部由多个抄写者使用的单一的记录方法。

这座监狱有一个名字，也有一个性别，这就是里昂圣保尔司法监狱，一座只用来关押男性犯人的场所。它于 1854 年投入使用，补全了当地的监狱设施。当时里昂与周边地区还有两座监狱：罗亚纳拘留所和圣约瑟夫教养所。这三个机构是由同一个主管来领导的，即包括罗讷省、艾恩省和卢瓦尔省在内的第二十监狱管理区的负责人。圣保尔监狱不是一座模范监狱，它是 19 世纪末普通监狱的代表，接收的犯人十分混杂：一些被判两年以上徒刑的年轻犯人，一些屡教不改被关在轻罪区的外乡人，一些因欠债不还而坐牢的人，一些被暂时羁押的人，也有一些发往轻罪庭审判的被告，或者一些已经初审判决，正在上诉或要求复审的犯人。圣保尔监狱坐落在罗讷河右岸的佩拉什街区，离圣约瑟夫教养所只有几步之遥，1859 年至 1861 年经过一番重大改造，才成了符合 1834 年法律的单独囚禁犯人的场所。在 苑座呈星状辐射开来的建筑物中间，隔出了 圆怨间单间牢房。

1861 年，当年轻的敲诈勒索犯被关进这座监狱时，住的

不是又黑又潮的暗牢，而是一间刷着暗黄色墙漆的单人牢房，房里只有一张小桌、一张床，墙上一个小窗洞，装着坚固的窗栅。囚徒关在里面，只有几件小物品：一个平底杯，一只饭盒，一个脚盆，一把扫帚，狱警随时可以搜查牢房。在圣保尔看守所，一般是在囚徒不在的时候搜查牢房。这也就意味着监狱里没有私人空间可言，一切都是公开的，日常生活得服从狱规的支配。不同的监狱，狱规也有松紧之分。不过每个囚徒都必须保持监房清洁，起床和睡眠受到严格监视。季节不同，作息时间也略有变动。每天有两顿粗劣的牢饭，如果囚徒想加饭，只要有钱，可以去食堂购买，但是数量有限制，以防止他去做不正当交易：每个囚徒可以购买缘四克鱼肉或者蔬果、豫厘升葡萄酒或者一升啤酒或苹果酒。囚徒也可以让外面送饭进来，限量与内购相同。囚徒的卫生亦受到限制：每半个月洗一次澡，病了有医生前来诊治。在圣保尔看守所，有时也有护士护理。囚徒如果愿意，可以参加宗教仪式，也可以请狱中神甫来做祈祷。他们可以在牢房里干活（如在里昂监狱，犯人在牢房里挑选滨豆、数珍珠）。劳动所得，他们可以拿到十分之七，因此他们可以积蓄自己的钱财。总之，狱方虽然规定每天都可以探监，可是实行起来，却只是限于星期四和星期日两天。探监者首先要得到监狱当局的批准，如果有预审法官或者刑事庭庭长的同意，又当别论。探视必须在会见室进行，有一个看守在一旁守着。

这座国家监狱对于文字作品的规定没有那么出名，但是更为独特。狱方对于文字作品，其用途、影响和流通范围都十分注意，但是有时也有点矛盾：文字既是严密审查的对象，但也是劝人改过自新的手段。

首先禁止囚徒张贴布告，只有狱方有权张贴布告和海报。

有些囚徒在壁上写写画画，雁过留名，而一般犯人却只能在家具登记单，在牢房里的犯人须知，有时也在食堂饭菜价目表上留下自己的痕迹。有些监狱在神甫要求下，也会出现专门为这种末日场所编写的“牢房年鉴”。年鉴空白处印着一些有道德寓意的小故事（如关于偷盗的训诫，酗酒的危害等等）。

圣保尔监狱的囚徒有写信的权利，不过信封不能封口。同样，他们也有收信的权利，只是发出的信与收到的信都要经过狱方的检查。任何能够引起歧义的语句都可能给作者带来惩罚。犯人不准谈论政治，不准评论时事，更不准批评政府和体制。除非是呈给法官、警察局长或者典狱长的书信，否则不准批评监狱管理人员。当局监管十分警惕，从严治狱，绝不许犯人私下传递信件。因为事关监狱的稳定、囚徒的安全。

囚徒如果愿意，并且有钱的话，可以在食堂里买到书写用品（蘸水笔、铅笔、墨水、纸张、簿子）。簿子卖价为 5 分到 1 元不等，视监狱而定，也就是说，一个鸡蛋的价钱。囚徒买这些物品没有限量，但是用途却规定得十分明确：每个簿子封面上都提请使用者注意，没有看守长的同意，不得撕下簿子里的任何一页。

尽管有这种监管，囚徒们还是能够彼此交换信息，并且保持了真正的地下通信关系。在圣保尔监狱，一个证人叙述说，囚徒们大量写信，或者是求取物品和帮助，或者是征求意见、表明看法、传播消息和歌曲，有时甚至是交换行窃技巧。“虽然没有邮局和邮差，监狱里却非常活跃地交流着便函、字条、书信、报纸和歌曲。”楼上的囚徒用一根丝线把各种信件吊到下层，再把下面的信息收上来。把手伸出窗户栅栏，摆荡吊在绳子上的信件，直到邻室的囚徒从他们的窗子栅栏间伸手接住为止。信件就这样一间间牢房传递下去，直到传到收信人手上

为止。不同楼房之间的通信办法是将信件带出去，落到院子里，由放风的犯人捡回去，交给收信人。大家约好一个共同的地点，囚徒们上小教堂礼拜或者放风时都要经过那里。如果负责清洁卫生的囚徒比较通融的话，事情办起来就容易得多：“因为他是一个非常适合的邮差。”

如果说在本世纪末，因为狱方的监管，也因为代价太大，写信和传递确实受到很大限制的话，那么图书的流通则并非如此，尤其是在圣保尔监狱。里昂的囚徒可以读书，有些人甚至可以大量阅读。囚徒可以在狱中图书馆借到书籍。

还在帝国时期，当局就开始采取在狱中设置图书馆的措施。这样做的目的是让囚徒通过阅读健康书籍，来净化灵魂。不过图书的来源只是靠个人捐献和囚徒自愿认购，设置监狱图书馆的做法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无法得到大量推广，仅有的几座也十分糟糕，图书杂乱不堪。因此，在接下来的数十年里，监狱当局要双倍操心。一方面要发动更多的囚徒读书，一方面又要确保所藏图书健康有益，有助于囚徒改过自新。因此，从1859年起，内政部批准建立监狱小图书馆，书籍来源可以由囚徒认购，也可以由当局拨款购置。1864年，塞纳省警察局颁发法令，决定在局本部建一座图书中心，在下面监狱建一所图书馆。图书或者是拨款购置，或者是接受捐赠。在监狱当局监管下，囚徒可以登记借阅。1870年12月14日的政府公报肯定了这一做法：“确实，应该尽可能消除囚徒无所事事的情况。除了放风，让他们在休息时读书似乎是打发无聊较为有效的办法。因此，关押年轻犯人的惩罚管教中心和公共监狱都得到国家拨款，配备了图书馆。有多家拘留所、管教院也办起了图书馆。可是，如果囚徒所读的图书不能在他们心灵上发生良好作用，不利于他们改过自新，那么就达不到设置图书馆的目

的。然而检查监狱图书馆书目之后，我们却有理由担心，人们并没有按上述范围挑选图书。”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内政部发布了由全国狱政视察会议成员组成的委员会所选择并审查的书目，只有列进了该书目的图书才能购买或者接受捐赠。对于适合男囚、女囚和儿童的作品还分别作了评介。按照这个公报，监狱图书只能在主管部门的监督下流通借阅，要根据每个囚徒的经历、才能和表现区别对待。这一来，监狱行政负责人根据公报，就可以禁止阅读某些作品。例如 1894 年 12 月 1 日，格里马纳利借出两部书：佩涅先生的《三种生活，或中央商场》和狄克索恩的《我的窍门》。照他的说法，这些书不利于囚徒净化灵魂、改过自新，不能借阅，并要从书目中删除。1894 年，政府就监狱图书馆的运作，出了一份新的公报，规定建立和更新监狱图书馆，只能由掌握了国家拨款、从巴黎购置图书、并且在主管部门监督下进行配发的供货商负责。在拘留所，一如在圣保尔监狱，由看守长负责保存这些图书。图书应该保存在教育室或者诉讼档案室，放在安有铁锁的分格分层的玻璃柜里。至于图书，封里应该标出书价，下面有一个单子，用来登记损坏图书者的姓名。损坏图书将从损坏者的劳役金中扣罚。关于作品的借阅流通管理，当时已有好几种办法，新的公报要求每本书立一份表册，可以立即查出依次借阅者的名单。当时监狱图书馆并没有统一的规定，不过公报明确要求监狱主管规定图书馆开放时间、图书借阅期限（通常一个星期）。同样，也应该规定禁止阅读的时间。

当年贯彻落实这些公报的程度，今日已经很难估计；监狱里图书使用与流通的历史，只有等待来日书写了，不过当时还是有些人写下了他们亲眼所见的这些图书馆的状况。马克西姆·杜康在 1894 年写道：“巴黎所有监狱都配置了图书馆。如

果囚徒要借书，狱方是不能拒绝的，除非是作为惩罚措施。警察总署每年用于购买书籍的经费达到 100 万法郎。” 1839 年，另一个治安部门的首脑马塞确认了监狱图书馆的存在：“每座监狱都拥有图书馆，里面藏有富有教益、利于灵魂改造的书籍。图书都编进目录，保存在典狱长办公室。在所有监狱里，马扎监狱图书馆办得最好，至少拥有七八千册图书，由一个有文化的表现良好的囚徒负责保管。” 1845 年，警察总署办公厅主任欧仁·波泰特注意到，各个监狱目录上的可借图书五花八门，真是应有尽有，或者几乎是应有尽有：哲学、宗教道德、古典文学、物理学、数学、自然科学、古代和现代史、地理书。除了这些，还有一些应景书、时尚书，如《美丽杂志》、《法兰西小画报》、《家庭博物馆》。当然也有专门为囚犯写的书，如《囚徒的静默》、《囚徒的镶嵌画》。但是波泰特尤其注意到，确切地说，塞纳省的拘留所没有图书管理员。“或者由典狱长，或者由一名表现良好、能够胜任的囚徒来管理图书馆……贵重图书由典狱长管理，其余图书找看守人员借阅……每个监狱都编制了图书目录，并且公之于众。囚徒借书，由典狱长或者担任管理员的囚徒登记在册。每册图书都是黑布精装。图书还回来以后，就在目录上贴一个标记。星期日和节假日，平常日子晚上和工休时间，监狱里静静的，囚犯都在读书。”圣保尔监狱的情形似乎与此相近：一个囚徒担任图书管理员；图书馆拥有 1000 册各类图书。

囚徒们读些什么书呢？如果不参考当时几个医生对囚徒读书所作的研究，这个问题就会很难回答。匀·乔利注意到，在塞纳省各家监狱，囚徒们竞相借阅《美丽杂志》、《家庭博物馆》、《环游世界》。“他们喜欢看那些东西，其原因还需要说吗？吸引他们的，是奇遇、冒险、已经发生或者尚未发生的

……他们喜欢读的文学作品，是大仲马的长篇小说。在大火箭监狱，那个大故事家的书几乎都翻坏了，需要替换。在卫生检疫所监狱也一样，这类书籍读的人也很多。”不过据乔利分析，囚徒们最想读的还不是这类东西，因为他们在外面时已经读过了。照医生看来，“不管囚徒在监狱里思想、感情、想像力有了什么改变”，他在外面和里面的阅读是有连贯性的。在圣保尔监狱，囚徒们的趣味似乎没有多大差别，他们大量阅读冒险小说，如斯蒂文森的和库柏的作品，但也读乔治·桑或者允·米什莱的东西。

监狱、狱政管理以及书籍在监狱的地位，对《我忏悔》这部奇书的写作很有影响，以至于可以视为写作这部书的基础，但是叙述故事的却是 匿名身陷囹圄，饱尝铁窗生活的囚徒。

这部叙述亲身经历的作品的主人公并不是自愿充当这种角色的，他们确实是一些匿名人士，突然从沉默中走出来，从暗处来到明处，又同样突然地从明处回到暗处，走向沉默。一个行动，一次出现，一个错失就使他们被人带到法庭，投入监狱的高墙，接着又把他们扔进蹒跚的历史。

1835年，拉费、卡塔纳奥和杜费特尔三个家伙合伙敲诈一个名叫马丁的先生，威胁说要向警察揭发他的同性恋行为。三个人多次得手，从受害人那里勒索了几笔巨款。过了几个月，马丁向当局报案，这几个家伙就被投入监狱。1836年 10月，一个叫埃米尔·努吉耶的家伙带领一帮同伙缠上里昂维莱特街区一家小酒馆的老板娘，先用啤酒瓶把她打昏，后来又把她勒死。调查者对现场的大便进行寄生虫分析，找出线索，最后抓到了凶手人，迫使他们很快承认了所犯的罪行。一年以

后的这一天，有人发现里昂一个寡妇被害，尸体被卸成几块。经过调查，受害者的朋友，一个名叫路易吉的意大利人被逮捕归案，但他否认犯这桩暴行以及后来查明是他所为的其他杀人卸尸罪行。1846年，在里昂乡下，两个年轻人在寓所杀死一个寡妇，泰西耶和塔韦尼埃被捕，供认了罪行。前者18岁，后者20岁，前者在后者的协助下杀死寡妇，劫得几个铜板。1847年7月，在圣太田，一对男女杀死一个退休的梳子生产商，在他身上捅了四刀。凶手在犯罪现场就被抓住了，他们一个是死者的侄女，在巴黎卖淫为生，名叫路易丝·夏尔东；一个是夏尔东的情人，名叫勒茹尔，杀人的动机似乎只是劫财。1848年5月，瓦尔省博里厄地方一个名叫维达尔的食品商贩被抓获，承认对一些年轻女性实施了侵犯，其中有两个因伤致死。1848年，一个名叫卡龙的家伙在里昂杀害了亲生母亲。在此之前，他已经因盗窃犯罪，三次被判几个月监禁。凶手对母亲拳打脚踢，又用钳子和锤子把她折磨致死，然后搜身，把她藏在胸衣里面的钱搜出来以后，就在尸体旁边大吃大喝。1849年，在安省贝莱地区，一场剧烈的打斗之后，里昂的夏尔·杜布勒，一个搞同性恋的家伙杀害了自己的母亲，就因为母亲不肯给他钱。凶手与母亲打了很久，然后扼死母亲，抢了她的钱，与情人厮混去了。一年之内，凶手遍游欧洲，甚至到了开罗，然后向警察投案自首，供认了罪行。

杜费特尔、卡塔纳奥、努吉耶、卡龙、杜布勒、夏尔东、塔韦尼埃、维达尔都很年轻，有几个跨进圣保尔监狱大门时刚刚20岁。他们大都来自罗讷河—阿尔卑斯山地区，好些人都在外国生活过，如邻近的瑞士和意大利，甚至还有有的在海外——如卡龙在美国，杜布勒在埃及，维达尔在苏丹住过，不过里昂和罗讷河—阿尔卑斯山地区是他们定居的地方。他们犯罪

时往往是孤身一人：卡塔纳奥、维达尔、里什多、杜费特尔和塔韦尼埃是单身汉，好像从来没有与女人一起生活过。反过来，珀蒂让却是个已婚男人，而且是一个孩子的父亲。路易丝·夏尔东也结过婚，并有多多个情夫与伴侣。被捕时，她与一个画家同居，又给一个名叫勒茹尔的惯犯当情妇。杜布勒是个同性恋者，与男伴库尔吉贝同居一室。他遇到这个年轻人，把他收容下来，给他吃，给他住，并且保护他。

他们的孤独常常伴有一些复杂的家庭故事，尤其少不了暴力、疾病和死亡。以卡龙、杜布勒和夏尔东这三个例子来说，这些难堪的家庭关系最终导致发生惨剧，把他们引进监狱：卡龙和杜布勒杀死了自己的母亲，夏尔东是谋杀舅舅的同谋。这些罪行只是一种肮脏和悲惨的生活的冰山一角。克洛德·卡龙在自己的回忆录里强调指出，在他的生活悲剧开始时，家庭关系扮演了重要角色。起初他看到父母之间经常“争吵和打骂”，接下来他在父母之间左右为难，得不到他们的支持。夏尔·杜布勒很早就感到自己对男人的吸引力，成人以后，他就经常去里昂的“性倒错者聚集地”鬼混。他母亲是个寡妇，不愿再听到儿子的丑闻，起初安排他去美国重塑人生，后来见他不肯去，并且不断要钱，她就好几次威胁说要取消他的继承权。路易丝·夏尔东 18 岁时就被一个姑夫糟蹋了，很早就离开了家庭，住在姑夫家，做了他的情妇。后来她去了巴黎，卖身为妓，经常回圣太田看望母亲（当时已被她丈夫，即路易丝的父亲抛弃）和姑夫。她与情夫勒茹尔合谋杀死并劫财的就是这位舅舅。亨利·维达尔从小有病，与母亲的关系也是极为恶劣。他母亲一生下他来就守了寡，她拥有一家饭店，但是不肯把经营权交给儿子，认为他难当此任。认为他的兄长勒奥波德更为适合。勒奥波德曾去苏丹冒险，人家怀疑他在马赛杀

了一个女佣。至于让·原弗朗索瓦·卡塔纳奥，他一生下来就被父亲抛弃，与母亲在波尔多相依为命，直到她悲惨去世为止。这个事件标志他的堕落开始。

他们在学校受了些什么教育呢？我们只能说他们的情况极为不同。夏尔东一直上到 15 岁，以后就辍了学，跟一个做模子的师傅学手艺。杜布勒一直读到 15 岁，进的是特洛亚斯中学。维达尔在瓦尔省的邦道尔受启蒙，可是少年时期患了伤寒症，只好辍学回家养病，他母亲是伊埃尔一家酒店的物业主人。杜费特尔所受的学校教育十分混乱：他小时候进的是一家教会学校，可是患了一种“精神病”，经常发作，无法修完中小学的学业，也就进不了神学院。珀蒂让的童年是在巴黎和巴约莱度过的，在这两个地方，他不愿坐在教室里听教师讲课，更喜欢跟着“小火箭团”那些顽皮孩子四处闲逛。卡龙的上学经历更是乏善可陈。才 15 岁的他就失去了大人的管教，全靠自己照料自己。“他不喜欢学校，因为不能充分利用时间，”就独自去了萨瓦，在那里他当然把学业也荒废了。回到里昂父亲家，他找了一份工作，在一个工匠家里当学徒。不过他的教育却没有中止：他慢慢开始看起了无政府主义的文学作品，并且购买自由派的报纸来读。不久以后，他就去听人类学和经济学的讲座。里什多的情形大致与他相似：童年是在一个“比较舒适”的环境度过的；15 岁左右，去都灵上职业技术学校，学了 3 年。父亲破产以后，他离开那所学校，开始打工挣钱。不过里什多并没有中断学习，相反他还开始攻读一些极为不同的学科。他学了法语、英语和化学。虽然是自学，但是里什多和卡龙都学到了扎实的知识。这群人里面，就数他们两个和杜布勒最有文化，而路易丝·夏尔东和塔韦尼埃则是学历最短的人。

他们走上社会以后，生活变得更不稳定，不但经常换工作，而且有时还陷入贫困的境地。杜布勒的情况就很有代表性：他 1852 年中学毕业以后，进了叔叔的针织品商行当职员，从 1854 年起，他先后在三家商行干过。两年后，他进了曼斯的加布遣会修道院，当初学修士。1856 年，被这家修道院开除以后，他又进了海滨蒙特勒伊的查尔特勒修道院。再次被开除出来以后，他在家闲了两年，进了贝莱一家天主教报纸《十字架报》打工。1858 年，他丢掉这份工作，转而进了里昂信贷银行，当记账员。1860 年，人家把他解雇了，从此他就再也没有工作，日子过得十分拮据，只靠母亲按时接济勉强度日。

里什多也过着同样的苦难生活。他在“上意大利”铁路公司当了几年职员，后来丢了这份工作，又找不到活儿干，只好离乡背井，来到法国马赛。可是他在这里还是没找到工作，就搭船到了阿尔及尔，因为有人答应在那边给他一份工作。可是诺言并没有兑现，他空手返回法国，到里昂地区定居。有两个月，他衣食无着。后来进了一户人家帮佣，看护病人。病人死后，他又去一户人家干同样的活，后来主人夫妇雇他在商店里干搬运工。几个月以后，他因为偷酒喝，被解雇了。这以后里什多学了几天徒，干起了鞋匠活，可是挣不到几个钱。他接受了一个差使，在里昂的卡米利安修道院当看门人，在那里一直干到 1862 年被捕为止。

至于亨利·维达尔，他的职业生涯深受家人关系的影响。起初，他在科西嘉服了 3 年兵役，回到伊埃尔以后，由于母亲不肯让他在自家店里担任大堂领班，他就在店里干了 3 年苦力。接下来，他与兄弟一起两下苏丹打工，第一次在那里住了一年半，第二次住了一年。回来后，又在自家店里打工。过了